

武更斌 著

毛泽东

THE REASON
FOR SUCCESS

胜因

靠什么统一大陆？

靠的是信仰坚定、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私利、一心为国为民、纪律严明、团结一致

(上册)



白山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THE REASON FOR SUCCESS 胜因

毛泽东

武更斌 著

靠什么统一大陆？

(上册)



前言

FOREWORD

一个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私利、一心为国为民、团结一致的智慧群体

1921年7月23日，由毛泽东等13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3名党员，没有一个是产业工人。只有武汉的党员郑凯卿是文华书院的工友，算是与工人沾边。其他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是有产阶级出身。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奇怪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传入中国的，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眼界是能够从外文原作或中国学者的译作中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 106 号。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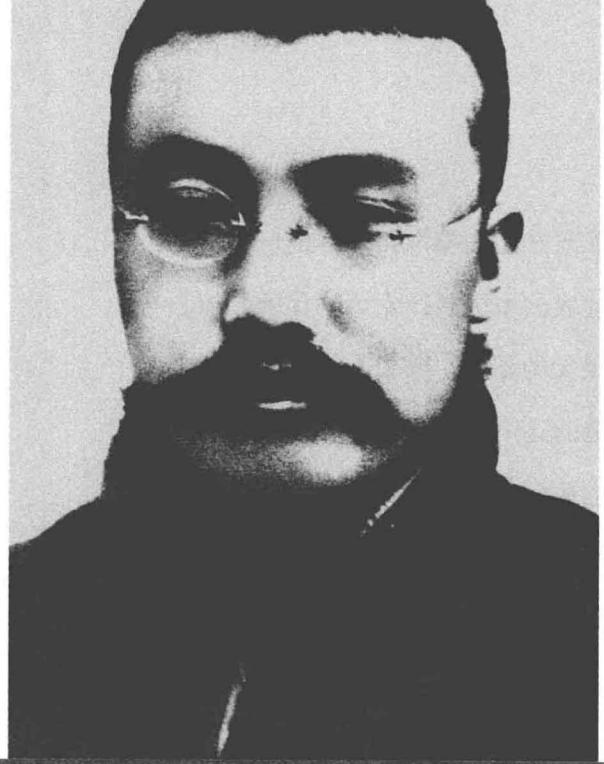


郑凯卿(1888—196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为党出生入死作了大量工作，他淡泊名利，解放后拒绝了董必武接他入京的邀请，终老林泉。



理论的基本条件。而在文盲占劳动者绝大多数的旧中国，家里没有几个钱，是没有条件供出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的，就是私塾也不是普通农家子弟所能读得起的。而创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有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而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视升官发财的前途如粪土，自觉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事业。

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让人惊奇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基本上是由“秀才”或“书生”的人所创立、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大革命失败后竟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纵横中国十几个省的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又过了十几年，他们竟然取得了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大国的政权，实现了他们在这个文明古国里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理想。



上图（左）：李大钊 上图（右）：陈独秀

下图：20世纪20年代北京普通市民在街边摊用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能够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功，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造反“秀才”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能够把中国革命引上正确轨道的这个基本前提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和所依靠的干部队伍是一个信仰坚定、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私利、一心为国为民、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智慧群体，从而使他们建立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才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举推翻几千年的旧秩序。他们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魅力所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群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00元大洋。当时的物价是1元大洋可以买4袋白面，一个普通警察的月薪不过是7元大洋，颐和园的门票是2元大洋，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除了高官显贵之外，周末能去颐和园游玩的只有北大的教授学者。可以说月薪300元大洋在那时已经可以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更何况执教之余还有丰厚的稿酬收入。如果仅仅从个人利益着想，李大钊、陈独秀根本就没有必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许多高级指挥员，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大批开国将帅都是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他们放弃高官厚禄，为人民的利益浴血奋战二十余年，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大革命时期担任师长的叶剑英元帅曾回忆说：“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收入。两三万元已经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



任滇军团长时的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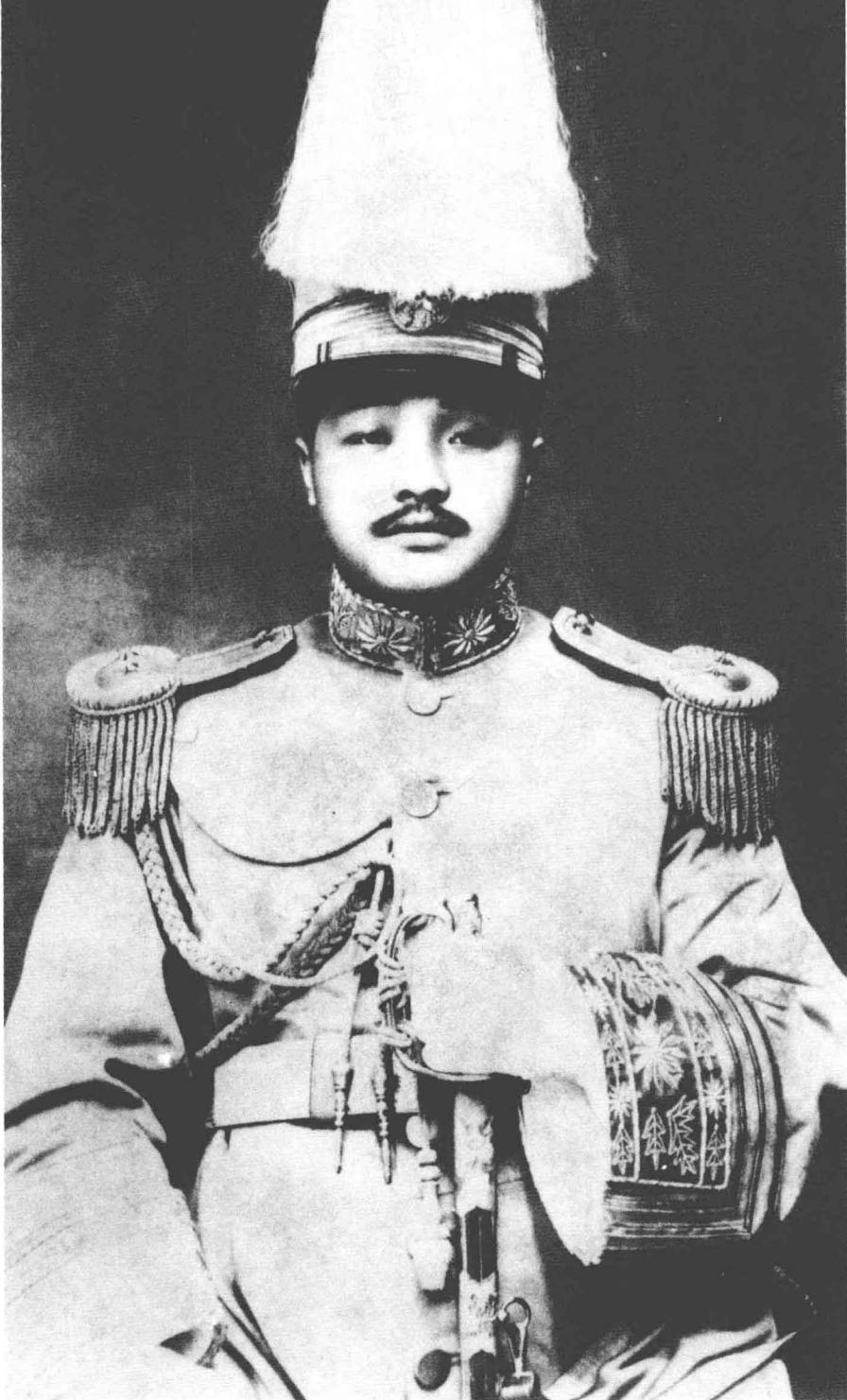
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的彭德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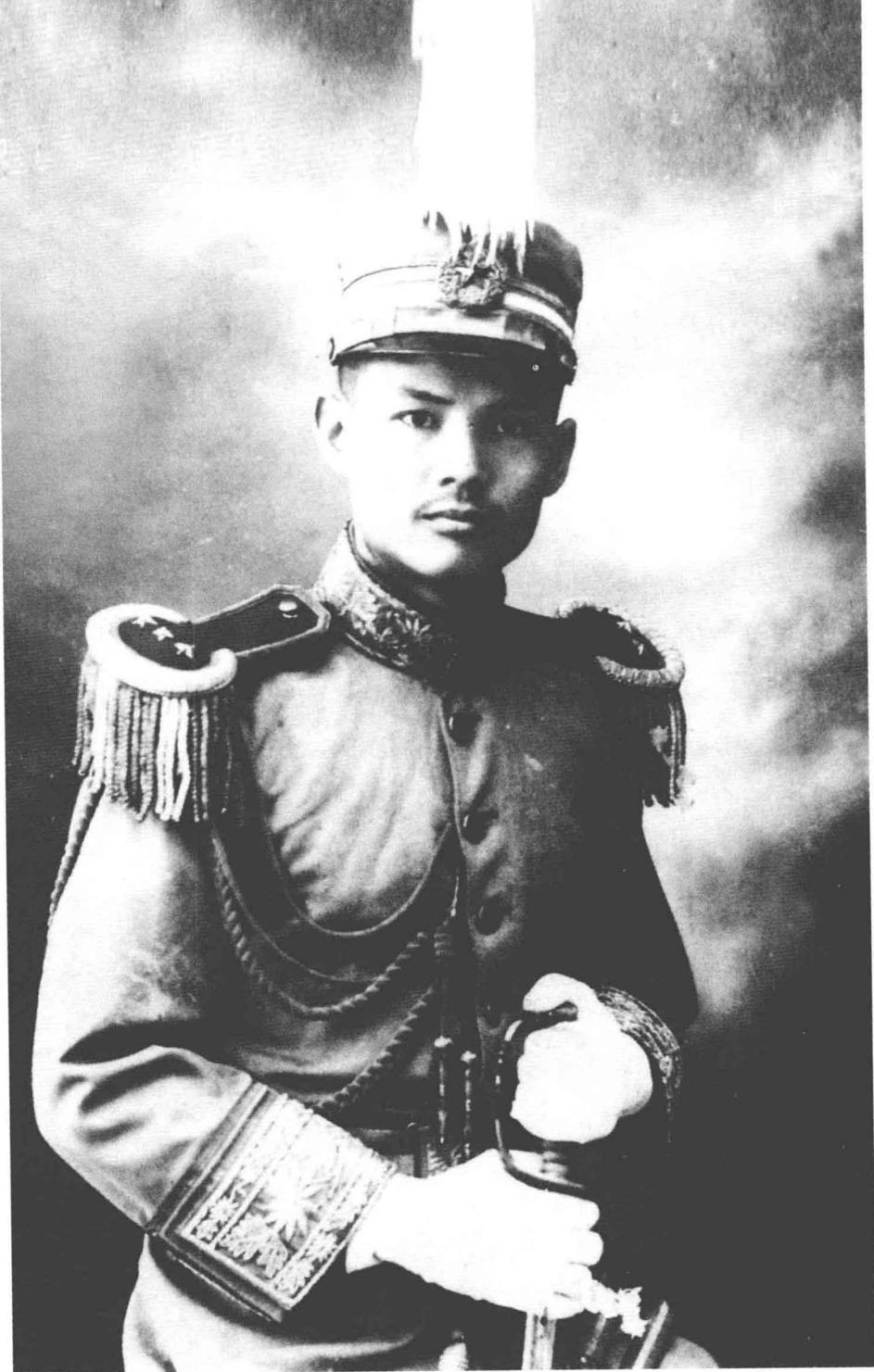


在川军熊克武部任职时的刘伯承





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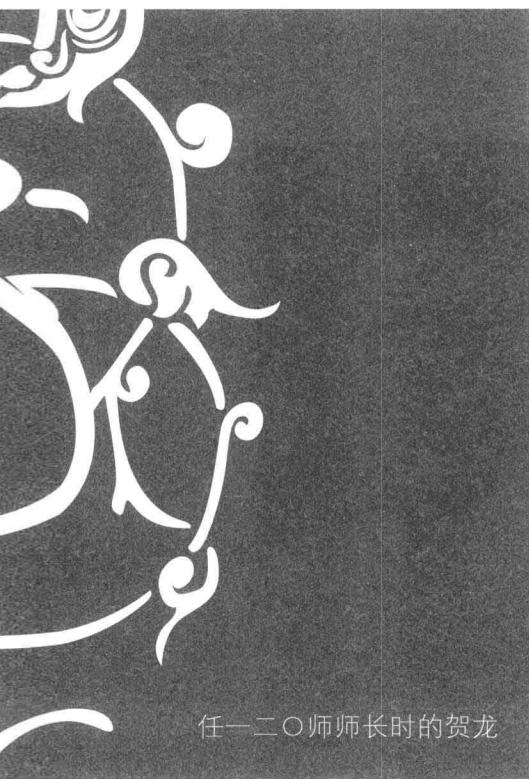
1921 年的叶剑英

两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卓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不怕牺牲的群体。在旧中国，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普鲁士和沙俄政府当年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者采取的驱逐出境、流放西伯利亚等刑罚，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根本不敢奢望的。因为旧中国当权者最惯用的手段就是屠杀。奉系军阀尽管对京城的一般“洋人”都奴颜婢膝，但为了抓共产党领导人，却可以不顾国际惯例，公然派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区抓捕李大钊，还发明“三绞处决法”以延长他的痛苦，把绞刑整整进行了 40 分钟，目的就是让人们唯恐沾“红”而大祸临头。

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于祭起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封建时代最野蛮、最血腥的杀戮手段。徐海东大将的 27 个近亲、39 个远亲，包括婴儿在内的男女老少共 66 人全部被杀光。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曾同蒋介石见过一次面，蒋随口问起贺龙家中可好，贺龙激愤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全家 80 多口人全被杀光，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蒋介石闻言颇为尴尬，无言以对。





任一二〇师师长时的贺龙



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多达32.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约占事变前共产党员总数的一半，但在被害者中只占百分之几，超过90%的遇难者都是靠近党的群众。历史上所讲的国民党反革命提出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就是在这时期提出的。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无所畏惧。中共鄂东特委书记何彬被捕后，敌人为软化其斗志，使用了利诱、亲情等各种手段。在得知他是有名的孝子后，把他的父亲接来当“说客”。但何彬丝毫不为所动，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为人民而死是“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要父



陈潭秋



向警予



亲只当没生这个儿子。陈诚看信后默然良久，对部下说：“此人伟大！”这就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对他的共产党死敌发出的由衷赞叹！

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组织。从建党之日起，就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纪律。那时，我们党的干部，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其经济来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职业革命家，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在生活上完全靠党提供少量生活费用。例如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武汉的党的负责人陈潭秋、向警予等，作为被通缉的共产党领袖，不可能有在社会上露面的公开职业，他们每月由党组织提供 20 元左右的生活费。鉴于党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干部不可能有很多，因此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其待遇和他们的级别根本没有关系，生活往往很艰苦。另一

种是身份没有暴露的、可以从事其他社会职业的党员，依靠职业收入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有的收入很微薄，有的相对比较宽裕，特别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党员。但中国共产党有一条极为严格的纪律，那就是党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要求一个党员放弃薪金优厚的职位，去从事艰苦危险的基层工作或去农村搞武装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谁犹豫不决，或寻找各种理由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么党组织就会切断与他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很有名气的共产党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脱党的。这一点是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根本无法相比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蒋介石也是自叹不如。在大陆失败的前一年，他就在演讲中斥责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他这样哀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与此同时，他还毫不隐讳地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欣赏。他要求国民党军官们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还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及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真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定……所以要归于失败。”

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自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临死之前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是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后也因此感慨良多。

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由无数对党有着坚